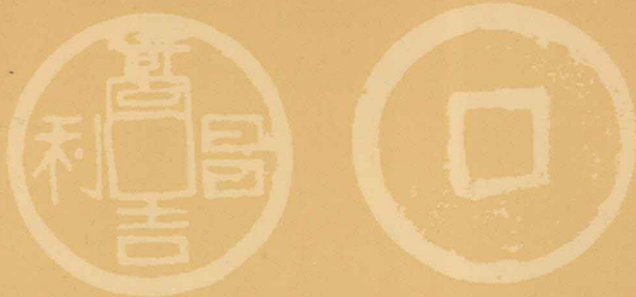


中国钱币丛书

甲种本之二十五



王永生 著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



中华书局

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之二十五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

永生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王永生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11.2

(中国钱币丛书. 甲种本;25)

ISBN 978 - 7 - 101 - 07576 - 2

I. 钱… II. 王… III. 西域 - 古钱(考古) - 研究
IV. K87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6613 号

书 名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
著 者	王永生
丛 书 名	中国钱币丛书甲种本之二十五
责任编辑	陈 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3½ 字数 490 千字
印 数	1 - 12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576 - 2
定 价	380.00 元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 问 戴志强

主 编 黄锡全 姚朔民

副主编 顾 青 金德平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永生 王贵忱 叶世昌 华觉明 汪圣铎

吴荣曾 周卫荣 金德平 姚朔民 顾 青

高聪明 黄锡全 裘锡圭 戴志强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缘起

近年来,随着我国钱币收藏、研究活动的日趋繁荣活跃,广大读者对钱币学著作的需要也日益提高。读者既需要高水平的研究著作,也需要深入浅出的普及性读物。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中国钱币学会准备编辑一套反映当代钱币学水平的《中国钱币丛书》,中华书局也拟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钱币丛书”。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协议合作,并邀请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共同编辑出版《中国钱币丛书》,以飨读者。

《中国钱币丛书》分甲种本和乙种本两种:甲种本为高水平的研究著作,力争反映当代钱币学的研究成果。乙种本为高质量的普及性读物,力争融学术性、知识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中国钱币丛书》的编辑,尚无经验,在构思选题以及其他方面,必然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我们诚恳地期望泉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合作与支持,以便能把它办得更好,更能反映当代的学术水平,更能适合广大读者的需要。

《中国钱币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4月

序

钱币,又称古钱币或历史货币,一般指退出流通领域的货币。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钱币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更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见证以及各个时代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缩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传统的古钱学“就钱论钱”开展研究,所编著的各式图谱多是专注于对钱币版别、尺寸、重量、图纹等的描述。实际上,钱币背面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反映着不断变革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因此,我曾多次强调我们的钱币研究工作应注意克服这种不足,不但要研究钱币本身,更要研究钱币背后所蕴涵的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历史,及其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工作要有新的发展和创新,要注意拓宽领域,增加深度,提高层次。应该说这一指导思想近年来在各级钱币学会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钱币研究面貌已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们有许多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其中由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同志撰写的《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

《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是王永生同志继 2007 年出版《新疆历史货币》一书之后完成的又一部学术专著,全书由“钱币考证”、“钱币文化研究”、“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以及“附录”和“钱币彩图”组成,收录了作者近二十年来撰写的 34 篇论文。主要涉及古代西域以及近代新疆和西藏地区铸造和流通的货币。坦率地讲,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非我所长,是否有重要发现或深入分析,需由专业人士进行评判。但是,作者的研究不限于钱币本身,而是通过对钱币的考证来对那些历史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则是我认可的。如:

《波斯伊利汗国仿行元朝钞法》首次论述了元代蒙古人在伊朗建立伊利汗国时曾模仿元朝纸币制度于 1294 年发行了波斯纸币。这是我国古代纸币文化及印刷技术传入中亚,并进而传入欧洲的明确记载,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至波斯语中至今仍将纸币称作 Chao(钞)。

《色章郭木金币考》是作者在 1992 年受命草拟为中国人民银行答复全国人大、外交部、国家民委、统战部等部委来函询问发行“色章郭木”金币纪念章复函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考证,证明该金币不但和“藏独”毫无关系,而且是 20 世纪初西藏地方政府为抵御英国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日益渗透而铸造发行的,澄清了这个历史问题。

《“高昌吉利”钱币考》首次指出铭文“吉利”并非来自汉语“大吉、大利”或“吉祥如意”,实为突厥语 ilik 或 ilig(汉译为“王”)的汉语音译,即突厥语官衔“吉利发”,这是西突厥册封高昌王的封号。作者认为这种用汉字拼读突厥语的现象与当时高昌地区特有的民族构成及其

文化特点有关:高昌王国内部是由汉族移民带来的农耕文化,而环绕王国四周的是以突厥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两种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作者据此分析了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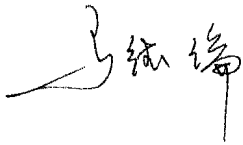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根据新疆考古新发现,第一次明确论证了自宋代以来就成为不解之谜的两种唐代钱币“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实际上是在安史之乱后坚守西域的唐代安西都护府守军在大历、建中年间于安西(今新疆库车)铸造的,属于最早的军用货币。流通使用范围仅限于当时安西守军主要控制范围,即新疆库车及其附近地区,主要供驻军使用。借助出土钱币所提供的线索,作者还就上元元年(760)以后唐朝在西域的坚守情况及吐蕃攻取西域的路线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东突”分裂势力铸造(印制)钱币考》、《民国新疆两种未发行(流通)纸币考》,则通过对民国时期“东突”分裂分子印制的钱币,以及图谋利用在民国政府发行的纸币上翻译维吾尔文时乘机宣传“东突”分裂思想阴谋破灭的考证,揭示了“东突”分裂思想的欺骗性及其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的危害,从而说明“东突”分裂思想是新疆稳定的现实威胁以及与之斗争的复杂性。

《俄国及前苏联在新疆铸行钱币三考》揭露了近代沙皇俄国在经济上对新疆进行的野蛮侵略和无耻掠夺以及民国初年苏联一贸易公司在新疆私铸银元宝而引起的两国间一段鲜为人知的有关“币政主权”的外交交涉。

《伊帖、阿尔泰通用银券考》通过对“伊帖”和“阿尔泰通用银券”两种纸币的考证,讲清了原由民国中央政府直辖的伊犁和阿尔泰地区行政上归属新疆省管辖,新疆最终实现全省行政统一的过程。

书中还有很多论述和观点,读者可以自己进行分析、评判。我希望我们的钱币研究工作者既要研究钱币本身,也能够从钱币的背面去挖掘它所蕴涵的更深层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研究钱币的意义所在,也真正体现了“古为今用”。借王永生同志《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出版之际,将我关于钱币研究的观点再次陈述一遍。



2008年11月29日

(马德伦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

目 录

序	马德伦(1)
---------	--------

第一部分 钱币考证

“高昌吉利”钱币考	(3)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铸地考	(19)
准噶尔普尔钱考	(31)
为平定张格尔叛乱铸造钱币考	(38)
清代反叛势力及入侵者铸行钱币三考	(42)
饷金、饷银考	(48)
伊帖、阿尔泰通用银券考	(59)
俄国及前苏联在新疆铸行钱币三考	(68)
民国新疆两种未发行(流通)纸币考	(83)
民国新疆割据军阀铸行钱币考	(89)
“东突”分裂势力铸造(印制)钱币考	(103)
三区纸币(期票)考	(114)
新疆银圆票考	(128)
色章郭木金币考	(140)

第二部分 钱币文化研究

钱币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	(147)
丝绸之路钱币(新疆段)考察报告	(165)
关于丝绸之路钱币研究的几点思考	(177)
王树枏货币思想研究	(182)
波斯伊利汗国仿行元朝钞法	(188)
新疆发现的越南钱币及其来源探讨	(197)
新疆钱币概述	(200)
研究新疆钱币的重要意义	(213)

第三部分 清代新疆铸钱局研究

叶尔羌局	(219)
阿克苏局	(231)
乌什局	(245)
库车局	(249)
喀什噶尔局	(260)
宝迪局(宝新局)	(267)
宝伊局	(274)

第四部分 附录

关于《新疆金银币图说》的几点修订意见	(293)
试论拉班·扫马出使欧洲及其影响	(300)
访日交流散记	(308)
深切怀念董老	(314)
我的父亲	(318)

第五部分 钱币彩图

目录	(325)
钱币彩图	(331)

后记	(363)
----------	-------

第一部分 钱币考证

“高昌吉利”钱币考

——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制成。正面为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旋读，背面无文。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肉好郭圆，制作精良，直径 25.5 毫米，穿 7 毫米，重约 14.3 克(图 A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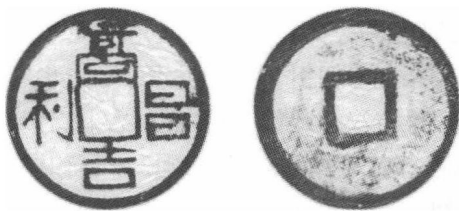


图 A1-1 高昌吉利

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最早载录，目前所知见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张敬庵所著《泉宝录》。据道光、咸丰年间张崇懿著《钱志新编》所引《泉宝录》记载：“高昌钱光幕，钱极厚重，乃高昌国所铸，未知出于何代。”^①根据该钱币历年出土发现，除一枚在西安何家村出土外，其余几乎全部都发现于古代称做“高昌”的新疆吐鲁番地区，且钱文中铸有“高昌”两字，因此，自乾嘉以来钱谱著录均断定其为古代高昌国所铸。这一推断钱币学界基本没有疑义，分歧主要集中在断代上，自北魏至元代，莫衷一是。关于钱文中的“吉利”两字，后世学者更多是从字意上直观地解释为大吉、大利，即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因而认定“高昌吉利”钱币属于吉语钱。客观地讲，这种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思路在解读“高昌吉利”钱币上，却是陷入了一个误区，因为“高昌吉利”四字中的“吉利”两字，虽然是汉字，但拼读的却是古突厥语，其对应的汉语意思完全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本文将从考释汉字“吉利”所拼读的古突厥语对音入手，结合高昌国历史的演进，以及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的突厥等游牧文化在高昌地区相互交融的背景，就“高昌吉利”钱币铭文的语义、铸造背景、年代及其性质做一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试就隋唐之际高昌

^① 张崇懿《钱志新编》卷十九《外夷》，1989年9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民国刊本影印。翁树培《古钱汇考》引刘燕庭语，“余藏有高昌吉利钱一枚，为仁和吴我鸥所赠。《泉宝录》以为高昌国钱，容或然也”。同治年间，李佐贤《古泉汇》录一钱拓。

地区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谈谈看法。

一、“高昌吉利”钱币的发现及研究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高昌吉利”钱币,已知的约有 50 枚左右(详见表 1)。其中,除两枚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经正式考古发掘所得,能够明确断定年代外,其余都是传世品或从民间采集所得。因此,自清代乾嘉以来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外钱币学界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研究文章不下二三十篇(详见表 2),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多都属主观推断,拿不出具有说服力的依据。仅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铸行年代,就能概括出如下五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1. 北魏说 以郑家相、王琳及英国的克力勃(M. R. Joe Cribb)等为代表。依据是“高昌吉利”四字为隶书,具北魏风格。高昌曾接受北魏册封,互有往来,受北魏影响而铸此钱^①。

2. 隋朝说 以卢健生、邹志谅等为代表。依据是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到达河西,高昌国王麴伯雅曾亲往会见并随行到中原,娶隋华容公主,受册封而回。归国后即“解辫削衽”实行服饰改革,推行汉化政策。铸“高昌吉利”钱币以为纪念^②。

3. 唐朝说 普遍持此说,以陈尊祥、盛观熙、周昆宁、蒋其祥、杨鲁安等为代表。依据是唐贞观四年(630)高昌国王麴文泰曾偕妻赴长安朝觐,受太宗隆重接待,赐其妻李姓并封长乐公主。“高昌吉利”钱币当为纪念此事而铸,或以为太宗铸行赏钱的可能性更大,可能铸于古都长安附近^③。

4. 五代十国说 以彭信威为代表,依据是“(‘高昌吉利’钱币)文字制作有点像刘燕的永安铜钱”。因此,他认为“年代最早只能看到五代十国,看不到南北朝或隋唐”^④。

5. 元朝说 以丁福保、黄文弼及日本的奥平昌洪和荷兰的易仲廷(Dr. TjongDing Yih)等为代表。认为“以高昌题名,必为高昌建国时代所铸。但以高昌国为国号或王号者,有两时期,一为麴氏建国时期……一为元朝……此钱或系十四世纪初期所铸也。其体制亦类元钱。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附于元钱之末,疑是”^⑤。

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性质,更有正式行用钱、纪念币、压胜钱、随葬用的冥钱等不同观

① [英]克力勃《有魔力的中国钱》,载《内蒙古金融》1986 年专辑。王琳《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钱币》,载《中国钱币》1987 年第 2 期。

② 卢健生《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疑补》,载《内蒙古金融》1985 年专辑。邹志谅《高昌吉利钱研究》,载《苏州钱币》1986 年总 2 期。

③ 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研究》,载《中国钱币》1984 年第 3 期。周昆宁《高昌国与高昌吉利古钱》,载《内蒙古金融》1985 年第 2 期。盛观熙《再论“高昌吉利”钱》,载《新疆钱币》增刊 2004 年第 3 期。蒋其祥《新疆古代钱币的发现与研究》,载《舟山钱币》1990 年第 3 期。杨鲁安《新出高昌吉利钱考》,见 2001 年部分城市钱币研讨会交流文章。

④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30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年。

⑤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1954 年刊载于中国科学院《考古学专刊》第 3 号。另,[日]奥平昌洪《东亚泉志》(昭和十三年 1939 年东京岩波书店发行)卷十一第 67 页记:“此钱系于古之高昌国,然其形制有元钱之风,当为元代高昌之地(在新疆镇西府之西部)之物,故今附于元钱之末。”

点;关于铸造地点也有铸于高昌本地和铸于中原内地两种不同说法。

在“高昌吉利”钱币的研究上,20世纪70年代初的两次考古发现具有重要意义。一次是1970年10月在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出土千余件各类文物,在36枚历代古钱币中,发现有一枚“高昌吉利”钱(彩图1)。郭沫若考证为安史之乱后邠王李守礼后人所窖藏^①。另一次是1973年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系联合考古队在吐鲁番阿斯塔那进行考古挖掘时,在保存完好的编号为519号的张隆裕妻麹文姿墓葬中,出土了一枚“高昌吉利”钱(彩图2),“此钱出土时,压于死者尸体之下,未经盗扰触动”^②,保存完好。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块唐贞观十六年(642)的墓志。

两次考古发掘各出土一枚“高昌吉利”钱币,特别是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编号为519号的墓葬中同时出土的纪年为唐贞观十六年(642)的一块墓志,非常重要。因为它为“高昌吉利”钱币的断代提供了科学依据,即“高昌吉利”钱币的最晚铸造时间不可能晚于唐贞观十六年,也就是公元642年。由此否定了此前以彭信威先生为代表的五代十国说,以丁福保、黄文弼、奥平昌洪等为代表的元朝说。自此,钱币界基本认定“高昌吉利”钱币为高昌王国时期所铸。

高昌建国实际上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取代阚爽,占据高昌称大凉王开始算起^③,到唐贞观十四年(640)麴智盛投降唐朝,高昌被改设为西州止,共历时198年。期间因柔然、高车、铁勒、突厥等外来游牧势力以及中原王朝的干涉,高昌王国曾先后经历了北凉沮渠氏、阚氏、张氏、马氏以及麴氏等统治时期。其中张氏、马氏统治时间很短,局势亦不稳定。麴氏统治时间最长,约有140年,历经十王、九世。“高昌吉利”钱币具体是在何时,由哪位高昌王因何而铸,则仍是众说纷纭。要解决这一难题,只能从解读一直被大家所忽视而实际上却非常重要的“吉利”两字入手。

二、“高昌吉利”钱文语义的考释

“高昌吉利”四字虽然都是汉字,但其所表达的寓意却是不同的,完全不能简单地按照汉字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和推测,因为这里汉字所拼读的是古突厥语,而不是字面上的汉字意思。

“高昌”在这里是指地名,位于吐鲁番城东约40公里处。据伯希和考订为突厥语 qočo 或 Khočo 的对音,这两个名称在上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从吐鲁番收集的突厥文写本中均有发

① 郭沫若《出土文物二三事》,见陈尊祥《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研究》,载《中国钱币》1984年第3期。

②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刊《文物》1975年第7期。另收《新疆考古三十年》11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 关于高昌建国的开始,文献记载与学者研究存在分歧。《北史·高昌传》3212—3213页(中华书局,1988年)明确记载和平元年(460)“蠕蠕(柔然——引者注)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但冯承钧、侯灿、荣新江等认为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取代阚爽,占据高昌称大凉王开始算起。

现^①。另据汉文献记载,“高昌”之称最早见于《汉书·车师传》^②,其得名是因为“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③。北魏人阚廞在《十三州志》记“高昌壁,故属敦煌”,这里的“故”,唐长孺先生认为“当指东汉”^④。王素根据出土文书记载西汉敦煌县已有高昌里,因此认为“高昌”之名应来自于敦煌县高昌里派出的屯戍士卒^⑤。此说成立,这与伯希和的考订实际上并不矛盾,只不过吐鲁番所出突厥语文写本中 qoço 或 Khoço 应是译自汉文“高昌”,只是伯希和将其关系给弄颠倒了而已。汉代在高昌设“戊己校尉”实行屯田,因建壁垒,称高昌壁。西晋始设郡,称高昌郡。北魏和平元年(460)在柔然支持下建立高昌国,高昌即为王城所在地,也就是今天新疆吐鲁番地区的哈刺和卓城(Karakhoja)。《高昌契氏家传》就明确记有“高昌今哈刺和卓也”。但民间则习惯将哈刺和卓城称做高昌故城,位于今吐鲁番市东约 40 公里处^⑥。



高昌故城遗址

“吉利”应为突厥语 ilik 或 ilig(即“王”)的汉语音译。据著名的古代突厥语言学家张铁山教授研究,突厥语 ilik 或 ilig 第一音节的 i 可对应音译为汉字“吉”的音,如 iltäbir 音译为颡利发或俟利发;ilteriç 音译为颡跌利施或颡俟施;irkin 音译为颡斤或俟斤。il 既可音译为伊利、乙利或意利,也可音译为颡利。ilik 或 ilig 的第二音节 lik 或 lig 显然与汉语“利”的读

① 冯承钧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77 页,中华书局,1982 年。

② 《汉书·车师传》有车师王“驰突出高昌壁”一句。

③ 《魏书·高昌传》2243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④ 唐长孺《魏晋时期有关高昌的一些资料》,载《中国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⑤ 王素《高昌得名新探》,载《西北史地》1992 年第 3 期。

⑥ 唐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高昌国后设西州。宋元时期为高昌回鹘国。《辽史》又称为和州回鹘,《金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均讹译为和州,《元史》及《明史》因此又译为哈刺火者、和州、火州等。

音是对应的^①。因此,汉字“吉利”实际上就是突厥语 *ilik* 或 *ilig* 的音译,汉籍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

据《旧唐书·突厥传下》记载,“颉利发”是突厥汗国的一种官衔或称号。西突厥在著名的统叶护可汗时,“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②。即将颉利发授予被突厥控制的西域各国国王,作为臣服的标志。高昌、龟兹等国国王都曾接受过颉利发的称号。

王国维先生考证认为,“颉利发”这一官衔或称号,如同可汗、可贺敦一样,都源自于柔然,后被突厥沿用^③。

韩儒林先生研究认为,“‘颉利发’之外,尚有俟利发、俟利伐、俟利弗、俟列发、希利发等异写,而‘颉利’则又有伊利、一利、意利、伊离等异文”^④。

实际上,“吉利”就是颉利发或颉利的异译,都译自突厥语 *ilik* 或 *ilig*,为突厥语“王”的汉语音译。

由以上考证,可知“高昌吉利”钱币上的铭文“高昌吉利”四字是用汉字拼读的古突厥语,意为高昌王。这是汉语和突厥语相互交融的结果,是高昌国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及其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三、高昌历史沿革及麴氏王朝梗概

在讨论“高昌吉利”钱币之前,有必要先就高昌的历史沿革以及麴氏王朝梗概做一简单叙述。

(一)高昌历史沿革

历史上的高昌,一般可概括分为高昌壁、高昌郡及高昌国三个时期。

高昌最初为汉代车师前部故地。车师的前身是姑师,元封三年(前108),被汉军击破,余众向北投靠匈奴,在博格达山南北形成车师国,分为前、后两部。后部位于天山北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一带;前部则位于天山南部的吐鲁番盆地。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管理屯田事宜^⑤。因屯田而筑壁垒,故又称高昌壁。这一时期汉朝为

① 参见岑仲勉《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载岑仲勉著《突厥集史》下册,1125页,中华书局,2004年。十多年前,笔者就曾猜测“吉利”两字应来自突厥语,可能与“颉利发”或“颉利”有关。前不久,笔者去看望中央民族大学突厥语言学教授张铁山博士时,特意向他请教,经其从语言学上考释,终被确认。

② 《旧唐书·突厥传下》5181页,中华书局,1975年。

③ 王国维《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曰:“自突厥崛起,高昌常为所役属,故其君相皆受突厥官号。……诸王或首领,皆有俟利发或颉利发号,盖突厥于其所属之国,皆授其王或首领以己国官职。……然俟利发一语,疑本出蠕蠕。突厥主称可汗,后称可贺敦,皆袭蠕蠕旧号,俟利发亦然。魏书蠕蠕传,阿那环族兄有俟力发示发,从父兄有俟力发婆罗门。突厥后起,故沿以为官号。”见《观堂集林》卷二十,987页,中华书局,1959年。

④ 韩儒林《突厥官号研究》,载《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1940年第1卷第1号。

⑤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华书局,1975年。

控制西域,而与匈奴在高昌地区展开了被称为“五争车师”的激烈争夺^①。

高昌设郡是由前凉统治者张骏完成的,西晋咸和二年(327)张骏在平定了戊己校尉赵贞的叛乱后,鉴于这里居民主要都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其生产方式及生活习惯与内地完全相同,因此设立了郡县。高昌郡下设高昌、田地两县,县下设有乡、里,形成了完整的郡、县、乡三级地方政权,使高昌由一个戊己校尉管理的半军事化的屯田基地,一变而成为了高昌郡的行政机构。这不但改变了高昌的地位,同时也是第一次将郡县制度推广到了西域地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高昌建国传统观点认为始自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北史·高昌传》记载:“太武时有阚爽者,自为高昌太守。……和平元年,为蠕蠕(即柔然——引者)所并。蠕蠕以阚伯周为高昌王,其称王自此始也。”实际上,高昌建国应从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沮渠无讳取代阚爽,占据高昌开始算起。因为当时沮渠无讳虽然没有称高昌王,而是称大凉王,但建立的却是国家政权组织。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高昌建国首先需具备一个王国的体制,这个体制并非高昌所固有,而是由沮渠氏从河西直接带来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在柔然支持下,沮渠安周驱逐了亲北魏的车师前部残余势力(居交河城)^②,统一吐鲁番盆地,奠定了历时将近二百年的高昌国之规模。

柔然于沮渠安周承平十八年(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攻陷高昌,杀安周,沮渠氏的高昌政权历经18年而灭亡。柔然扶植了傀儡阚伯周为高昌王,从此高昌历史进入了称王的时代。

柔然扶植的阚伯周是否与18年前兵败后逃奔柔然的阚爽有血缘关系,史无记载,不得而知。但阚伯周完全忠实于柔然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在其执政的二十多年里,未见朝贡北魏的记载。阚伯周死后,其子义成继立,当年就被从兄首归所杀。阚首归自立后执政10多年,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被新兴的高车王阿伏至罗所杀^③,阿伏至罗立敦煌人张孟明为高昌王。5年后,国人杀高车扶植的张孟明,另立马儒为王。第二年,马儒便遣使北魏奉表朝贡,甚至请求举国内徙。这一明显过分的亲魏姿态自然招致了高昌国内土著大户们的反对,致使马儒于上台三年后即太和二十三年(499)被杀,麴嘉被立为高昌王。高昌历史进入了麴氏王朝统治时期。麴氏王朝初立之时,正值柔然与高车争夺西域的控制权,所以麴嘉执政后即称臣于柔然,15年后,当柔然可汗伏图被高车所杀后,麴嘉又随即称臣于高车。永平元年(508)还遣使朝贡过北魏^④。麴嘉的后继者继承了这种向外称臣的政策,后来兴起的铁勒、突厥都是其宗主国。因此,高昌王国自麴氏王朝开始,虽然国力弱小,但是,因为能灵活地周旋

① 车师地区为西汉屯田重点,也是控制西域的关键,从武帝天汉二年(前99)开始,直到宣帝神爵二年(前64),匈奴内乱,负责西域事务的日逐王降汉,汉朝才最终控制这一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郑吉被任命为第一任都护。

② 《魏书·车师国传》2264页,中华书局,1974年。

③ 《魏书·高昌传》记此事于太和五年,《资治通鉴》记为齐高帝建元三年,均为481年。但据冯承钧考证,太和五年高车尚未西迁,高车王阿伏至罗不可能杀阚首归,应是太和十五年(491)之误(见《高昌事辑》,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63年)。

④ 《魏书·高昌传》2244页。